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社会工作的 实践逻辑及策略

——以广东 X 村的社区减贫项目为例

尚 静 张和清

[摘 要]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二者具有内在联系和递进关系。当前,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嵌入理论,以社会工作在广东一个山村推动的社区减贫项目为例,探讨社会工作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逻辑及策略。积极介入生计是社会工作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和着力点。在介入生计的过程中,社会工作需要遵循“经济嵌入生态—社会”的逻辑,通过识别生计资产、组织合作生产、构建扁平化市场、营造社区共同体等行动策略推动经济、生态、社会协同发展。社会工作基于上述逻辑及策略的社区实践有助于防止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问题,迈向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

[关键词] 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 社会工作; 嵌入

DOI:10.13240/j.cnki.caujsse.2021.04.003

一、问题的提出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二者具有内在联系和递进关系。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统筹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据此编制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都明确强调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和相互促进。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搞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既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然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当前,研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党和国家对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寄予了期望。《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三区计划’、‘服务机构牵手计划’、‘教育对口扶贫计划’,为贫困人口提供生计发展、能力提升、心理支持等专业服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都提出“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还强调“推动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置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等方式”为农村边缘弱势群体提供服务。这些重要文件为社

[收稿日期] 2021-0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实验的‘单项服务’模式研究”(16AZD031)。

[作者简介] 尚 静,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生;

张和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契机。

社会工作领域关于乡村减贫的研究起步较早,内容广泛多元。已有研究从社会工作介入减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2]、社会工作与减贫的同构性^[3-4]、社会工作介入减贫可借鉴的理论视角及实践路径^[5-9]以及后脱贫攻坚时代社会工作的介入理论、机制和方法^[10-11]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并且相关研究还在继续丰富与完善。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相关议题也开始得到关注。在理论方面,研究者或从二者价值观、目标等方面的亲及性及理论、方法上的优势来说明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2-14];或引入发展性社会工作、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等模式并将其作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可借鉴的理论基础^[15-16];抑或尝试构建乡村振兴战略下具有包容性的农村社会工作体系^[17]。在实践方面,研究者主要从实践案例^[18]和服务群体^[19]等方面讨论参与的路径、策略等。

虽然关于乡村减贫的既有研究蕴含着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也涵括了社会工作推进可持续减贫的空间,但暂未有研究聚焦于社会工作如何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此,本文将立足时代背景,在梳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嵌入理论,以社会工作推动广东一个山村生计发展的项目为例,探讨社会工作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社区实践逻辑及策略,寻求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可能道路。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一)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与农村现代化、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两项重大举措,二者关系密切^[20]。本文主要围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以及如何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两个面向来进行文献回顾。

针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已有研究认为:其一,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21]和重要基础。脱贫攻坚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到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确保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在人的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和绝对贫困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难以真正实现乡村振兴^[22]。脱贫攻坚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条件、提升贫困地区发展能力、创造益贫式发展环境、完善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构筑坚实基础^[23]。其二,乡村振兴战略是脱贫攻坚的延伸和拓展。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我国的绝对贫困已被消除,但相对贫困还将长期存在。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将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到那时,现在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举措要逐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统筹安排。”乡村振兴可以通过提质并巩固产业扶贫、化解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矛盾、建立可持续脱贫的长效机制来巩固提升贫困地区的脱贫质量^[23]。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有助于提高行动效率,推动“三农”工作承前启后,确保各项目标的实现。

针对如何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围绕制度论述如何衔接。这里的制度包括体制机制、各项政策规划等。脱贫攻坚战中探索出的精准统计、“五级书记”抓扶贫、“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驻村帮扶、干部与贫困户结对帮扶、社会动员机制、考核监督机制、项目统筹机制等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可以坚持或调整使用,同时还要设计一些长远的适应新阶段的制度和办法,尤其要建立稳定脱贫机制^[23-26]。二是围绕产业论述如何衔接。借鉴产业扶贫的经验和模式,通过科学规划产业布局、立足资源禀赋发展适度规模的特色种植养殖业、延伸产业链以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搭建农产品网络销

售平台、探索小农产业发展并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建立贫困人口可长期收益的利益联结机制等方法来实现衔接^[22 24 27-28]。三是围绕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论述如何衔接。新阶段要稳步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继续加强面向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的社会服务, 增强社会保障力度^[23]。此外, 还有学者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出发, 提出通过升级产业减贫、发展绿色减贫、强化组织衔接、推动文化减贫、提升人才培养来实现有效衔接^[29]。

制度的顶层设计事关根本, 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行动纲领和资源保障, 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建言献策的方式参与其中, 亦可以通过专业服务补位协助政府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除此以外, 社会工作更需要直面农村经济议题, 尤其是在刚刚摆脱绝对贫困或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农村地区, 应积极介入生计, 建立长效减贫机制, 防止返贫和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在脱贫攻坚战中, 产业扶贫是“五个一批”中首个“一批”。在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中, 产业兴旺排在首位。张和清等学者在云南少数民族贫困村庄的本土实践已经证明社工无法回避村民的生计困扰问题^[30]。但这不等于“唯经济论”, 也并非否认生态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 而是对脱贫攻坚所强调的产业扶贫和乡村振兴所强调的产业兴旺的实践响应。

(二) 嵌入理论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首次使用“嵌入”概念考察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他指出, 经济是嵌入社会之中的, 经济并非经济理论所设想的是自足的, 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在19世纪以前, 互惠、再分配和家计是组织生产与分配秩序以及保证经济体系运转的三个行为原则, 彼时经济体系被吸纳在社会体系之中。而在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的现代市场经济到来后, 按照“自发调节”机制运转的市场试图将劳动力、土地(自然)和货币作为虚拟商品^①在市场上进行收购和售卖, 经济开始脱嵌于社会, 经济逻辑开始凌驾于社会逻辑之上^{[31]序15}。虽然波兰尼认为完全脱嵌的市场经济无疑是一种乌托邦想象, 但不妨碍其将脱嵌作为一种隐喻式分析方法和策略, 用来描述市场在社会中的位置问题^[32]。当脱嵌之势形成并不断加剧时, 会对生态和社会造成巨大伤害: “市场体系在处理一个人的劳动力时, 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自然界将被化约为它的基本元素, 邻里关系和乡间风景将被损毁, 河流将被污染, 军事安全将会受到威胁, 食物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也将被破坏殆尽。最后, 对购买力的市场控制将周期性地肃清扼杀商业企业”^{[31]41-47, 59-63}。

过去几十年, 中国农村经济飞速发展, 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王绍光认为波兰尼的分析框架对认识中国农村过去几十年经历的转型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他看来,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是一种伦理经济, 20世纪90年代后, 现代市场原则除了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 还大规模侵入非经济领域, 大有成为整合社会生活机制的势头, 传统的伦理经济格局逐步瓦解。在中国转向市场社会时, 出现经济试图“脱嵌”于社会、并进而支配社会的趋势^[33]。在这种背景下, 农村生态和社会难以避免地受到市场力量的冲击, 许多村庄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社会关系疏离、传统文化衰落、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

面对脱嵌带来的严重后果, 波兰尼认为需要将经济重新嵌入社会中。事实上, 在市场不断扩张的同时, 现代社会也出现了意图将市场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的反向运动, 该运动基于社会保护原则, 运用各种手段实现对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保护^{[31]112-114}。生态(自然)与社会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生态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同时人类又通过劳动能动地改变生态。因此, 波兰尼所提出的将经济嵌入社会的反向运动其实也蕴含着生态保护之意。但需要指出的是,

① 波兰尼认为商品是被经验性地界定为在市场上销售而生产出来的物品, 但劳动力、土地(自然)和货币显然不是商品, 三者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 不过他们又实实在在地在市场上被买卖, 因此, 波兰尼将其称为虚拟商品(虚构商品)。

生态与社会毕竟属于不同的范畴,为了更清晰地进行讨论,本文在波兰尼思想的基础上,将“经济嵌入社会”扩展为“经济嵌入生态—社会”。

不同于以往迁移式运用嵌入理论解释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特征^[34]的研究思路,本文运用波兰尼关于嵌入理论的本原性分析来探讨社会工作应如何处理经济、生态、社会之间的关系。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对于本文思考农村产业发展和社会工作介入生计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为思考经济、生态、社会的关系提供了颇具洞察力的视角,引导我们将生态和社会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为产业发展和社会工作介入生计提供了实践方向,提醒我们将经济嵌入生态和社会中,推动三者实现协同式发展和互促式发展。

三、“经济嵌入生态—社会”的实践逻辑及行动演绎

X村是一个人口四百余人的自然村,其中常住人口约为总人口的一半。现有耕地二百余亩,人均不足六分,但山地面积广阔,约有一万五千亩,人均可达三十多亩。2009年,广州市民政局开展农村社会工作试点项目,由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承接该项目。在市、区、镇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经过实地踏查与各方协商,绿耕本着弱势优先的专业理念及其过往在云南少数民族村庄、四川映秀灾后重建的实践经验,将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贫困村庄X村作为项目的中心实验区。

笔者在过去几年中多次进入田野,了解社区情况,并与社工和村民建立联系。本文主要运用参与式观察法、访谈法和文献法来收集资料。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参与了社区文化广场建造、体验游接待、社工工作会议及社区聚餐等活动,也会在大树下与村民聊天等,这些使笔者有机会在相对自然的情境中进行观察,获得比较真实和自然的一手资料。访谈对象主要包括绿耕驻村社工、负责城市网络工作的社工、参加生计合作组的村民及其他村民,文献资料主要是项目开展以来的大量服务文书,包括项目申报书、社区调查报告、服务计划、服务总结、评估报告等。

自试点工作启动以来,社工先后推动村民开展了农业(以生态种植为主)、加工业(以青梅加工为主)和服务业(将乡村旅社、社区导赏、社区农墟、民宿等项目串联起来整合为生态体验游)三种不同类型的生计项目(表1),同时链接资源打造祠堂、村民活动中心、文化广场、社区厨房等公共空

表1 社工在X村推动的主要生计项目

生计项目	开展时间	主要内容
乡村旅社	2010	组织村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八位妇女运营由老围屋改造而成的乡村旅社,负责进村游人和培训团体的吃住。
社区农墟	2011	当游人或培训团体进村时,村民开墟售卖生态或半生态种植的农产品及初级加工产品。社区农墟可让更多村民参与进来,尤其为老人搭建一个“老有所为”的平台。
生态种植	2012	生态种植蔬菜、番薯、花生、水果等。初期有21户农户,由于农产品尤其是蔬菜配送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过程中也出现了成员退出和蔬菜种植暂时中止的现象。
青梅加工	2013	利用生态种植的青梅作为原料进行手工加工,生产无添加的梅精、梅汁、Q梅等系列产品。2016年,X村与M村的13位村民共同注册成立青梅加工合作社。
民宿	2014	随着游人的增加,乡村旅社有时无法提供足够的房间和床位,为了满足住宿需求,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扩大生计项目的覆盖面,社工顺势推动民宿发展。
社区导赏	2015	初期由五位返乡青年与一位自然知识丰富的长者根据社区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设计线路和解说词,安排导赏活动等,主要负责游人和培训团队的行、赏与玩。
田间学校	2018	初期有六户农户参加,绿耕与一个致力于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公益组织共同推动X村与M村有心从事生态种植的村民成立田间学校,这是早期生态种植的延续和发展。

间,并通过社区教育、举办大型社区活动等方式提升村民意识,并尝试改变其生活方式。在项目开始的第二年,社工就将工作延伸到与X村同一公路沿线的M村。

在为期10年的历程中,生计始终是社工实践的重心,发展生计也成为社工开展其他工作的一个有力切入点。这与绿耕早期在云南少数民族贫困村庄的实践经验有关,也与当前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研究领域强调产业发展的理论观点十分契合。在X村,社工虽然积极介入生计,但并没有将经济视作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是将其置于生态和社会系统中进行思考。换言之,社工实践遵循了“经济嵌入生态—社会”的逻辑,并采取具体行动策略来演绎这一逻辑。

(一) 识别生计资产

乡村拥有什么资产,如何看待这些资产,是发展生计的前提。在“脱嵌”的模型中,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要素被视为商品,它们的生态性和社会性从一开始就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因环境退化或资源耗竭而带来的生计风险也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因此,要将经济嵌入生态与社会,首先需要以保育而非榨取的视角检视社区资产,以确保生计的可持续性。同时,乡村社区经常被视作需要、问题和不足的集合体,其优势和资源容易被忽视。这种取向会从内部削弱社区发展能力,甚至给社区带来毁灭性打击。但实际上,即使是“穷人中的穷人”,也拥有优势的生计资产,也会做出积极的决策,而非被动等待救助的失能者^[35]。因此,社工还需要秉持优势视角,关注社区有什么资产,而非聚焦于社区缺什么或问题是什么^[36],并以此作为介入的基础^①。

乡村的生计资产一般包括自然资产、物质资产、经济/金融资产、人力资产、社会资产和文化资产等几类^[37]。对于像X村这样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偏远山村来讲,自然和劳动力是其发展生计的重要资产。过去几十年里,X村围绕这两项资产形成了砍伐山林、种植砂糖橘和外出务工三种主要生计方式,在提高收入的同时,也因为过于注重短期经济利益而造成生态和社会问题。砍伐山林严重时,山上望过去“光秃秃一片”(访谈记录,20180915,村民CY),造成水土流失。不过这种情况在2014年开始严格执行封山育林政策后基本消失,但生态恢复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始于2003年的大规模单一化砂糖橘种植高度依赖化肥农药,破坏生态环境并对农业生产形成反噬,造成生态和生计风险。自1990年代持续至今的进城务工是农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但也造成了农村家庭支持和照顾被削弱、城市社会排斥和农村空心化等社会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社工需要秉持保育和优势视角,重新识别并盘点社区中被村民忽视、废弃或破坏性使用的社区资产,据此设计出发展可持续生计的行动方案。初入X村,两位驻村社工对村民和村委会成员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村庄人口、生计、文化风俗、社会关系、自然环境等基本情况,并通过社区走访实地观察社区环境及村民的日常生活。一个多月后,社工形成了一份调研报告。这份报告不仅分析了X村面临的基本问题和需要,更重要的是,它以保育和优势视角对社区资产进行了识别,将土地、山地、溪流、动植物等自然资产,祠堂、老围屋、在地知识、村史等物质资产和文化资产作为发展生计的重要基础,据此制定出行动方案,包括发展蔬菜种植、有机水稻种植、生态体验游、民宿(后称为乡村旅社)、竹编竹艺(后成为生态体验游的一个环节)等。这份行动方案基本勾勒出了日后的生计实践框架,先后付诸实践,演化为生态种植、乡村旅社运营、生态体验游(包括社区导赏、生态农墟、竹艺竹编、农耕体验等)等生计项目。

青梅加工的缘起也与社工对生计资产的重新识别和保护性重构有关。1990年代,青梅作为当地“一村一品”的主推品种开始在X村大面积种植,鼎盛时期家家户户都有一片青梅林。但当附近的话梅加工厂关闭后,青梅开始变得无价无市。青梅树年年结果,且产量不低,经常因为无人采摘而落地腐烂,后来越来越多的青梅树被砍掉换成栽种砂糖橘树。到2013年,除了零星留存的青梅

① 以优势视角检视生计资产,并不是对社区问题视而不见,也不是逃避及解决问题,而是强调先持有优势视角,重新构建社区的各类外显或潜在资产,将其作为生产要素盘活并善用,在社区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问题。

树外,整个X村就只剩下一片成规模的青梅林,并且其也面临着被砂糖橘树取而代之的风险。这让社工非常着急,因为青梅树是一种粗生粗长的植物,可以不施肥喷药而生长结果。但是砂糖橘树对化肥农药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一般果树,大规模单一化种植更加剧了这种依赖,造成土壤板结、肥力下降、水体污染等环境问题,病虫害也愈演愈烈。因此,相对砂糖橘,粗生粗长的青梅更易于种植,具有先天的生态优势。保护青梅林的关键在于,如何将青梅转变为可用的生计资产。当时负责城市网络工作的社工根据自身的学习经历,推动几位村民将青梅加工为梅精,在广州农墟市集意外卖光,让村民和社工看到了发展青梅手工加工的希望,原本计划砍掉青梅林的村民也改变了主意。这为之后正式推动青梅加工及生态种植奠定了基础,也证明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生计资产有可能获得新生。

“2012年的时候,社区伙伴组织支持我去台湾实习,看到台湾很多农贸市集做一些加工的产品,他们的加工都发展得非常好,但我们当时很少有加工的东西,都是一些初级农产品和材料的销售。当时我去的是高雄的微风市集,跟很多农友打交道,看到他们做加工的食物,其中就有青梅。我就觉得:太好了!就想X村也有青梅,但别人收就收,不收就烂在地里。看到他们做,又是Q梅啊,又是青梅醋啊,又是青梅精啊。我就把制作过程很认真地记录下来。回来后,开始主要找了旅社小组的几位阿姨,因为要熬夜去熬梅精嘛……后面就几个阿姨、几个工作人员轮着排班,熬了两锅。然后我们把青梅酱拿去广州的农夫市集卖,很快就卖掉了。”(访谈记录,20180523,社工RH)

(二) 组织合作生产

受人多地少的农业资源禀赋、土地公有和承包经营权制度以及农业生产和农民家庭经营特点等因素影响,小农会在中国长期存在^[38]。截至2016年底,我国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小规模农户占总数的97%左右,其经营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约82%^[39]。小农虽然数量庞大,但分散经营的他们无力与资本博弈,被排挤出农业产业链中利润较高的加工、物流和销售环节,即使在生产环节也因为资本对农资价格和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控制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利润空间和生产自主性,这导致小农利润微薄,却承担了过多的市场风险、生态风险和社会风险。因此,将小农组织起来进行合作生产是发展乡村产业的基础,也是社会工作将经济嵌入生态与社会的重要策略。

首先,社工从现实问题切入,阐明合作生产的必要性,协助村民克服“怕麻烦”的心态。早已习惯“单打独斗”的村民起初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合作,同时也惧怕合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人际纷争。在推动村民成立青梅加工小组时,一位为人直爽的村民觉得合作是一件麻烦事,坦言宁愿出钱请人做也不愿意与人合作。社工所持有的价值取向使其并未刻板遵循“案主自决”原则,明确拒绝了“请人做”的提议。因为这会形成类似“老板—伙计”的雇佣关系,主导分配的是资本投入及生产资料的拥有状况,受益最大的只是作为“老板”的个别村民,这与发展可持续生计、保护生态和重塑社会关系的目标相去甚远。为了让村民接纳合作,社工从生产、销售、风险等现实问题入手向村民解释为何合作:于生产而言,单家单户分开做无法保证青梅产品口味和质量的稳定,同一类产品的口味相差太大会破坏消费者的信任和持续购买意愿,一旦有人生产并卖出低品质产品,可能会波及整个青梅产品的销售;于销售而言,单干会使现有的销售资源面临“给谁用”“用多少”“谁先用谁后用”的艰难选择,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会引发村民的不满;于风险而言,青梅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会面临一些潜在风险,互助合作可以降低风险的冲击。这些现实问题触动了村民,最终同意合作。

其次,确立生态友好理念,理顺合作机制,兼顾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弱势扶助。在X村,砍伐山林和滥用化肥农药大规模种植砂糖橘的生计方式对土壤、水体和生物多样性造成了破坏,当持续的环境退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反过来影响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因此,不管是生态种植、青梅加工,还是生态体验游,都是在生态友好的理念下展开的,将对经济的关注延伸到对生态的照顾。同时,社工还通过引导各生计小组统一采购原材料、以“品鉴会”的方式确立品质标准和生产流程等

方式理顺合作机制,尤其通过确立按劳分配机制推动合作向纵深发展。青梅加工、社区导赏、乡村旅社这几个合作程度较高的生计项目的收益是在计算整体产出的基础上按劳分配给个人,在无法精确测量每个人劳动效率和产出的情况下,经济收益主要按照劳动时间来计算,村民投工一天的收益大致相同。这种彰显劳动价值的分配方式更为公平,但当遇到个别组员干活较慢或态度不积极时,其他组员会觉得有失公平。例如,在青梅加工小组扩大生产规模时,社工本着扶助弱势的原则,积极动员村中两位边缘弱势青年加入,但其中一位青年因为行动迟缓和爱抱怨而使同组村民心生不满。“有他等于没有,还要有人耐心地去教他怎么做,这不算,他还一直抱怨”(摘自社工LJ2014年4月工作总结)。面对这种状况,有村民提议按照“做一天给一天工钱”的方式解决,但其本质还是雇佣,与互助合作理念南辕北辙。经过商量讨论,社工建议依旧遵循按劳分配原则,但是鉴于梅精制作过程繁复,这位青年暂不参与梅精制作及其收益分配,从而在分配公平和扶助弱势之间寻求平衡。

最后,进行赋权与能力建设,提高村民的主体性参与。农村发展离不开外部支持,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性参与。现实中农民不参与或弱参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权能不足,对他们进行赋权和能力建设,提升主体性与行动效能,就有可能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新型的可持续关系^{[40]194}。社工积极链接外部资金和人力资源,通过“授人以渔”式的教育、培训和学习活动让村民掌握新的知识技能,如邀请专业人士进村教授或申请基金支持村民外出学习农作物的生态种植技术和农产品的手工加工技艺;再如与一家致力于开展自然教育的公益组织合作,邀请其工作人员进村为社区导赏小组的村民进行在地培训,引导村民了解自己村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协助设计导赏路线,提高导赏解说的技巧。

“2016年3月跟随学习自然教育、导赏,这次是全程跟着,从前期他们进村踩点一起商量一些活动安排,到协助开展活动,直到整个活动结束,第一天夜观结束一起进行总结分享后,我们接着一起聊了一下自己的感受和收获,聊了很多,从感受收获聊到目前导赏小组的现状要做哪些改进等……大家一起做的学习形式很好,有时说很多遍未必能理解,但是一起做几次,很多东西就理解了。”(摘自社工GL2016年3月工作总结)

(三) 构建扁平化市场

现在的农产品市场不再是原来的地方性集贸市场,而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跨时空的市场。农产品从土地到餐桌要经历层层中间环节,其基本流通模式是“生产农户—产地中间商—市场批发商—市场中间商—零售商—消费者”^{[41]256}。这也是一个层级化的长链市场,控制战略性节点的工商资本尤其是大型商业资本占有了农产品的绝大部分价值,个体小农户缺乏直接进入市场的通道,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生态环境被过度损耗,农村社会结构也被消解,而消费者也面临着购买价格相对较高、食品安全和健康风险等问题。在这样的市场体系中,生产者与消费者、农村与城市、生态与社会被区隔开来^[42]。因此,构建扁平化市场成为社工实践的一个重要行动策略。扁平化市场与叶敬忠和贺聪志两位学者所提出的“巢状市场”^[42]类似,旨在绕过长链市场通道,将被中间环节区隔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农村与城市、社会与生态进行重新联结。

在农村开展工作的同时,绿耕以“前店后村”的方式同步在广州成立并自主运营公平贸易店,直销村民生产的农产品,并通过理念宣传、会员制等方式凝聚了一批消费者。同时,进入一些社区和新建楼盘进行宣传推广,以突破店铺的空间限制,拓展销售范围和消费者网络。除了个体消费者外,社工还着重与涉农公益组织、幼儿园、有机餐厅、有机生活馆、农场、社会企业等机构进行合作。一个机构就如同一个枢纽,以其为中心联结许多消费者,拥有自己的消费网络。社工与这些机构进行合作,相当于实现了消费网络的共享,且能节约很多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近几年,随着电子网络技术的兴起,微信、微店成为社工整合拓展销售范围和消费网络一个重要媒介。微店提供了一个让人们更加了解生产者以及生产过程的平台,除了基本信息外,还会图文并茂地将生产者、生产过

程、产品特点、使用方法等如实告诉消费者,有时还会介绍生产背后的故事,增加消费者对产品和生产者的了解。截至2020年上半年,有1100多人关注微店,其中忠实“粉丝”近150人;微信群则是实时互动交流的平台,除了进行产品销售动员外,社工还会及时在群里分享最新动态,发起话题讨论。而农户也可以直接在群里发布生产过程、产品信息和推介信息,消费者可以以接龙的方式登记购买信息或及时提出疑问或表达对农户的支持,等等。

然而,生产与消费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受气候变化、鸟虫害等因素影响,农产品尤其是蔬菜产量不稳定,少的时候无东西可卖,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多的时候又担心卖不出去,尤其当一些村民为降低难度而种植一些易打理的品种,却不符合消费者的口味选择和消费喜好时,销售压力骤增。另外,受人力和成本限制,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社工搭乘公共交通或偶尔包车的配送方式无法保证农副产品的新鲜度,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如果再遇大雨或太阳暴晒,产品损耗大,卖相也差,对于保质期短的叶茎类蔬菜来说,影响尤甚。

为此,社工通过举办城乡见面会、安排村民轮流进城参与农墟市集、消费者下乡体验等方式组织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互动。这一方面使生产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消费者的需求,以便调整生产过程进行有效对接;另一方面让消费者更能理解生态农产品生产的困境和价值。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引导村民根据消费需求制定种植计划,支持村民通过培训和外出参访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同时以食品安全讲座、影视播放、论坛等形式开展多元的消费者教育活动,引导消费者适当调整消费需求以支持生态生产,并提升消费意识,协助消费者克服限制生态消费的结构制约以及个体的自利动机,在食物和健康之外,关注“三农”和生态环境等社会议题。

(四) 营造社区共同体

社区共同体的瓦解制约着乡村社会的重建。社会学关于中国乡村研究的一个核心诊断是传统村落共同体已经瓦解^[43]。在社会转型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社区之间互动、依赖度和认同度的降低以及市场规则和经济利益对人们行为的主导都造成了社区共同体的瓦解。一般而言,维护村落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力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莫斯论述的礼物赠予—接收—反馈的行为过程,以及基于此形成的社会联结与社会团结构成了村庄社会内部的互惠秩序;二是依托社区公共财力,围绕社区公共物品供给与管理、社区合作、社区公共意识培育和公共行为引导为核心的社区互动及其形成的秩序^[44]。除此以外,在农民变得原子化和功利化的当下,重塑乡村共同体还应该考虑人的问题。因此,本文认为社会工作需以介入生计为切入点培育生计组织及其成员成为先行者,为营造社区共同体的力量提供行动依托。

在现实因素制约下,X村的生计组织难以在短期内覆盖所有村民,但生计项目的发展其实与整个社区生态环境、村居环境等公共资源的使用密不可分,因此社工秉承“回馈社区”的理念推动各个生计组织设置社区公益金制度,将盈余的一部分以社区公益金的形式转变为集体收益,以充实社区公共财力。与此同时,社工推动已经逐渐成长起来的生计组织成员设计开展一系列面向社区的活动。这些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探访关怀弱势群体,弘扬传统守望相助的精神。“关于公益金的使用,其实大家提出了几个不同的意见,有人说可以买有机肥给小组成员,就有小组其他人反对,觉得公益金应该用在村子里面,正好又是中秋节,所以大家就提出给村里的老人家送月饼,决定了这个之后,就讨论要送给哪些老人,一开始大家想到的也是老人院的老人和五保户,后来又觉得这些老人家政府过节的时候会给他们送东西,所以商量还是觉得要送给村里真的需要帮助的老人,于是经过商量确定了六位老人。在中秋节当天送给老人。”(摘自社工LJ2013年9月工作总结)第二,开展不同主题的社区活动,提升社区意识和社区认同,改善社区社会关系。随着可持续生计项目的发展,生计组织成员的环保意识逐渐觉醒,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有了批判性反思和行动。2016年,针对村民习惯使用一次性塑料水杯的现象,社工与几个生计组织商议替代方案。“那些塑料杯子用来喝开水是有毒的,对身体很不好,还污染环境,我们就让大家知道这样是不好的,但

是光说用处不大,就想到用公益金买玻璃杯发给大家。”(访谈记录 20171102 村民 CJ 访谈)于是用公益金购买了一批玻璃杯,向每家每户分发一套,并向村民解释塑料杯喝开水对身体和环境的危害。此外,还开展活动引导儿童关注社区和自然,同时借此契机改善社会关系。“小朋友们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尝试着与人打招呼,虽然是一个简单的礼貌,但却让他们和村里长辈的‘关系’发生着变化。我们会提供一些小的志愿服务机会,如制作班车时间表张贴在村子里显眼的地方为村民提供便利,通过玩游戏带领小朋友清除公共空间的杂草,捡拾村庄的垃圾……”(摘自绿耕简报第 012 期)第三,以人力支持和物资支持的方式参与公共空间打造,推动社区公共事务发展。例如,生计组织曾利用公益金为村中风水池的修葺提供资金;在项目到期社工不再驻村后,以生计组织骨干村民为代表的内生力量自主筹措费用续租并打理原来利用老围屋打造的公共活动中心。这些活动自下而上地提供了社区公共物品和服务,增强了社区互动、社区联结和社区团结,改善了社会关系,提高了社区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对复兴传统守望相助的互惠精神和秩序产生了积极作用,为社区发展注入了可持续的内生动能,也为地区发展带来了新生力量。

四、结论与讨论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时代背景下,本文引入嵌入理论试图回答社会工作在实践中应如何处理经济、生态、社会之间的关系。当前诸多理论思考和案例研究已经表明,社会工作需要直面农村的经济发展议题,在理论层面将生计纳入专业视野,在实践层面积极介入村民的生计活动,同时将经济嵌入生态和社会中去思考,促进经济、生态、社会三者形成协同发展的格局。

积极介入生计是社会工作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和着力点。在介入生计的过程中,社会工作需要遵循“经济嵌入生态—社会”的逻辑,在识别农村生计资产的基础上,将分散经营的小农组织起来进行生态友好的合作生产,构建生产者与消费者对接的扁平化互惠市场,并推动主体性得到提升的生计组织及其成员作为内生力量营造社区共同体。社工的生计实践产生了三重效应:(1)经济方面,农村一二三产业形成了融合发展之势,农民(尤其是边缘弱势者)收入增加且增收更具可持续性,有助于降低生计脆弱性和返贫风险;(2)生态方面,减少了农业种植过程中化肥农药的施用量,提高了农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有助于改善土壤肥力和水体质量,维护生物多样性;(3)社会方面,社会关系和社区公共参与得以改善,在地知识和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发扬,有助于营造乡村共同体,提高农民的身份认同和社区认同,同时也有利于城乡融合。社会工作基于“经济嵌入生态—社会”逻辑及策略的生计实践有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和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迈向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

社工介入生计的实践继承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到 70 年代末我国农村集体劳动时期^[45]以集体劳动促进劳动公平的理念,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后者将合作纳入国家大生产中,对劳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劳动者与社区的关系^[46]以及人与自然的关注较少。前者则除了积极介入生计之外,还非常关注实践的生态面向和社会面向,试图将经济嵌入生态—社会,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关系,重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与集体劳动时期对大规模的强调有所不同,新时期的合作生产应该遵守适度规模的原则。由于受自然条件、生物因素、农业劳动过程难以标准化及不易监督、扁平化市场构建需要时间等方面的限制,合作生产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因此,社工应该基于适度规模的原则组织合作生产,这也与国家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文件中多次提及的“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相契合。

[参考文献]

[1] 李迎生,郭燕.推动社会工作精准介入反贫困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5):92-103

- [2] 东波, 颜宪源. 农村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反人文贫困的可能性探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 103-107
- [3] 王思斌. 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参与——兼论实践型精准扶贫. 社会工作 2016(3): 3-9
- [4] 顾东辉. 精准扶贫内涵与实务: 社会工作视角的初步解读. 社会工作 2016(5): 3-14
- [5] 钱宁. 农村发展中的新贫困与社区能力建设: 社会工作的视角. 思想战线 2007(1): 20-26
- [6] 张和清.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问题与农村社会工作. 社会科学战线 2012(8): 175-185
- [7] 程萍.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 阿马蒂亚·森的赋权增能视角. 社会工作 2016(5): 15-23
- [8] 向德平, 华汛子, 金旂. 视角转换与方式创新: 减贫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7(6): 5-11
- [9] 尚静, 张和清. 贫困、环境退化与绿色减贫——一个华南村庄的社会工作实践案例研究. 开放时代 2020(6): 61-76
- [10] 王思斌. 后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建构.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 1-11
- [11] 郭思源. 构建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社会工作的实践.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 83-96
- [12] 陈涛, 徐其龙. 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模式研究——以北京市Z村为例.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4): 73-77
- [13] 陈相云. 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 实践困境、价值亲和与专业突围. 理论月刊 2018(4): 151-156
- [14] 袁小平. 农村社会工作对乡村振兴的因应研究. 甘肃社会科学 2019(4): 147-153
- [15] 郭燕. 助力乡村振兴: 发展性社会工作路向的介入空间与创新. 社会建设 2018(5): 64-75
- [16] 萧易忻. 论经济全球化下的乡村振兴: 再思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0(1): 21-28
- [17] 郭伟和. 构建包容性中国特色农村社会工作体系——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介入策略探索. 学习与实践 2020(1): 83-90
- [18] 汪鸿波, 费梅苹.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反思及分层互嵌. 甘肃社会科学 2019(1): 179-185
- [19] 刘艺, 蒲威东. 乡村振兴: 农村老龄化与社会工作介入——以山东省W市H村为例.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1): 84-93
- [20] 汪三贵, 冯紫曦.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关系. 贵州社会科学 2020(1): 4-6
- [21] 习近平.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社会主义论坛 2019(7): 4-6
- [22] 汪三贵, 冯紫曦.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逻辑关系、内涵与重点内容.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8-14
- [23] 左停, 刘文婧, 李博. 梯度推进与优化升级: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21-28
- [24] 毛中明.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应做好“五个衔接”. 光明日报 2021-01-12(02)
- [25] 黄承伟. 决胜脱贫攻坚的若干前沿问题. 甘肃社会科学 2019(6): 1-8
- [26] 卢黎歌, 武星星. 后扶贫时期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学理阐释.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0(2): 89-96
- [27] 豆书龙, 叶敬忠.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 改革 2019(1): 19-29
- [28] 涂圣伟.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目标导向、重点领域与关键举措. 中国农村经济 2020(8): 2-12
- [29] 张琦. 稳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人民论坛 2019(24): 84-86
- [30] 张和清, 杨锡聪, 古学斌. 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 社会学研究 2008(6): 174-193
- [31] 波兰尼.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冯钢, 刘阳,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32] 符平. “嵌入性”: 两种取向及其分歧. 社会学研究 2009(5): 141-164
- [33] 王绍光. 大转型: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 2008(1): 129-148
- [34] 王思斌. 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 社会科学战线 2011(2): 206-222
- [35] KRANTZ L.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to poverty reduction: an introduction.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01

- [36] HASHAGEN S. Simple as ABCD?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from a scottish perspective , does 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deliver social justice. Seminar Report by SECC Glasgow , Scotland ,Supported by the Carnegie UK Trust 2006
- [37] CARNEY D. Implementing the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pproach // CARNEY D , ed.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what contributions can we make? DFID , London , 1998
- [38] 吴重庆 张慧鹏. 小农与乡村振兴——现代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中小农户的结构性困境与出路.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13-24
- [39] 屈冬玉. 以信息化加快推进小农现代化. 人民日报 2017-06-05(07)
- [40] DOMINELLI L. Green social work: from environmental crises to environmental just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2012
- [41] 黄宗智. 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 实践与理论.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 [42] 叶敬忠 贺聪志. 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 2019(2):137-158
- [43] 卢成仁. 流动中村落共同体何以维系——一个中缅边境村落的流动与互惠行为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15(1):166-189
- [44] 李文钢 马良灿.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复兴与乡土社会重建——学术回应与研究反思. 社会学评论 2020(6):58-68
- [45] 刘金海. 农民的“集体劳动”: 缘由、规范及实施. 中共党史研究 2010(2):27-35
- [46] 闫红红 郭燕平 古学斌. 合作经济、集体劳动与农村妇女——一个华南村落的乡村旅舍实践案例. 妇女研究论丛 2017(6):36-47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Vitalization: Practical Logics and Strategies of Social Work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Community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in X Village

SHANG Jing ZHANG Heqing

Abstract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are two important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era. They are interrelated and progressive. At present , the effective linkage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strategies ,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embedding theory and takes a community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promoted by social work in a mountain village in Guangdong as an example ,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logics and strategies of social work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livelihood is the key and focal point of social work to promot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Whiling participating in livelihood , social work should follow the logic of “economy embedded in ecology-society” ,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 ecology and society through actions and strategies such as identifying livelihood assets , organizing cooperative production , flattening the market and building community. Based on the above logics and strategies of community practices , social work can help prevent the return to poverty and solve the relative poverty problem , and can achieve the all-round 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 talents , culture , ecology and organization.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vitalization; Social work; Embed